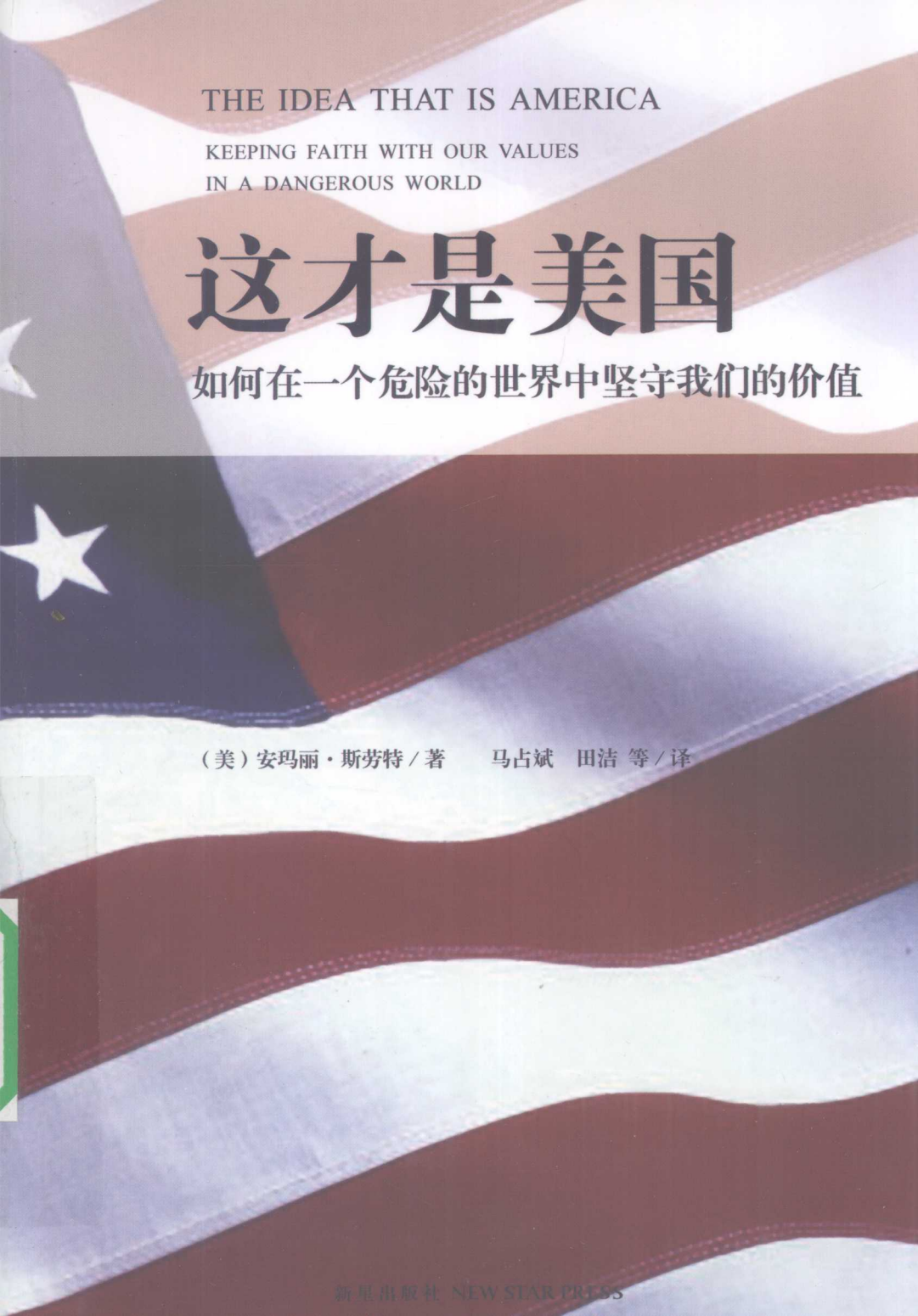


The background of the entire cover is a stylized, wavy American flag. The stripes are in shades of red, white, and blue, and the stars are white on a blue field.

THE IDEA THAT IS AMERICA

KEEPING FAITH WITH OUR VALUES
IN A DANGEROUS WORLD

这才是美国

如何在一个危险的世界中坚守我们的价值

(美) 安玛丽·斯劳特 / 著 马占斌 田洁 等 /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THE IDEA THAT IS AMERICA

KEEPING FAITH WITH OUR VALUES
IN A DANGEROUS WORLD

这才是美国

如何在一个危险的世界中坚守我们的价值

(美) 安玛丽·斯劳特 / 著

马占斌 田洁 等 /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这才是美国:如何在一个危险的世界中坚守我们的价值/(美)斯劳特著;

马占斌等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1

ISBN 978-7-80225-630-9

I. 这... II. ①斯...②马... III. 美国对外政策 IV. D837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14410 号

The Idea that is America:

Keeping Faith with Our Values in a Dangerous World

by Anne-Marie Slaughter

Copyright © 2007 by Anne-Marie Slaughter and Thomas Hal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sic Books

a Member of the Perseus Books Group.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9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Published by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这才是美国:如何在一个危险的世界中坚守我们的价值

(美)安玛丽·斯劳特/著 马占斌 田洁等/译

责任编辑:吕 林

装帧设计:林 涛 秦 嶷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 本: 880 × 1240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175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一版 2009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0 001~6 000

书 号: ISBN 978-7-80225-630-9

定 价: 27.00 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中文版序

《这才是美国》一书被译成中文并得以在中国发行，对此我感到骄傲、欣喜和感激。我感到骄傲，是因为我的一位好友将我介绍了上海的一批知识分子，他们对我在书中的论述产生了足够的兴趣，因而主动提出可以安排把书译成中文。基于我们之间的热烈讨论，我骄傲地将自己当作他们这群人中的一个远在美国的成员。我感到欣喜，是因为自2007年8月至2008年5月，我和家人一起在上海住了10个月之后，我感到与中国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纽带，对于我的著述能够面向更广大的中国读者，我也深感荣幸。在书中我曾有提及，我的比利时外祖父，他生前酷爱中国的艺术和文明，在我很小的时候，便教我欣赏唐代和宋代花瓶纯净的曲线之美，青花釉的色彩和细致精美，朱奎绘画的创意和神韵。很久以后，我自己发现了20世纪的中国绘画作品，它们以齐白石为代表并且也包括雄浑有力和感人至深的石鲁的作品，此外还有李白的诗歌。中国的思想拥有多种表现形式，在艺术上，文学上，以及试探性地，在政治的和全国性的讨论上体现出来。我对我能够以一个美国人的角度，对这种思辨做哪怕一点儿微薄

的贡献而心怀感激。

我于2004年和2005年间撰写《这才是美国》之时，从未想到我的著作会在我可以称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为总统的时候在国外出版。他的当选是这才是美国的最高体现。正如奥巴马在当选当晚向观众所演说的那样：“如果还有人在怀疑美国是否是一个一切皆有可能的国度；如果还有人疑虑我们国家的缔造者的梦想在今天是否依然鲜活；如果还有人在质疑我们民主的力量，今晚你已经有了答案。”在本书的美国版序言中，我引用了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对宣誓加入美国国籍的新公民们做的演说：

你们诸位刚刚宣誓效忠美国。是向谁效忠？不是任何人，除非是上帝。你们肯定不是效忠于那些暂时代表这个伟大政府的人。你们宣誓效忠的是一个伟大的理想，一套伟大的原则，以及人类的一个伟大的希望。

奥巴马的当选是那个理想、那些原则和那个希望的胜利。自独立以来，美国向世界揭示了一个为人民所拥戴的政府实际上是可能的、可以成功的。如果说，1825年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对之慨叹，那么，2008年，奥巴马的当选则向全世界，也向美国人民自己表明：不仅更新政府是可能的，而且，还存在着自下而上地彻底改造政府的可能。

然而，奥巴马的故事并不纯粹是个正面的故事，它也揭示出美国较阴暗的一面，并且，它仍然是一个关于如何应对挑战的故事。也正因为如此，它反映了这才是美国。对于奥巴马的支持，

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绝大多数感到国家正在步入歧途的选民们，他们反对布什当局的政策，认为它们在许多方面违背了自由、公正、平等、宽容和谦逊精神的价值观。那些占大多数的民众最终作出了决定，他们不信奉“爱我国家，无论对错”，认为要把错误的政策和决定纠正过来。此外，竞选活动本身也揭示出许多白人选民仍不愿意投票给一位非裔的总统候选人；广泛存在的对于不同种族背景的移民的不包容；为了自以为是的安全而情愿牺牲自由和公正；以及更为普遍地认为：我们的安全凌驾于我们的价值之上，而不是源于我们的价值观。此外，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我们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急剧增加，结果导致一大部分美国人得不到适当的医疗保障和适当的教育和工作，以便参与 21 世纪的竞争。正视并且承认那些在美国生活中所存在的污点，是推动美国历史演进的一种动力，因此需要正视和承认这些污点的存在，才能够启动消除这些污点的工作进程。

最后，奥巴马本人以及他的竞选运动以有助于在美国人的生活中重申那些价值的方式，将谦逊和信念结合在了一起。奥巴马的谦逊并不意味着他没有个人的自我意识；对于自己的能力，他有着恰当的自信和把握。然而，他的竞选口号自始至终，包括他胜选那一刻，都是“这不是关乎我自己，而是关乎你们大家”，这口号感染了数以百万计的支持者。他不仅明白自己作为一个人，甚至作为总统，其能力的局限性，而且他也深知即便是一个完全称职、积极主动的政府的局限性。变革要求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的总动员，这是一个更大的、远非任何一个个人和由个人组成的

团队所能胜任的事件。然而,动员广大的民众,不能仅仅靠动嘴巴就能做到,而是要靠倾听、学习和适应新知识以及变化了的情况。这种见识正是谦逊的核心所在。

同时,奥巴马的谦逊是与信念结合在一起的。在和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争夺民主党候选人资格的角逐中,奥巴马的个人信仰曾经成为一个问题,许多选民对于他先前的牧师耶里米·莱特(Jeremiah Wright)的观点发出了质疑。在总统大选中,某些选民仍然相信关于“奥巴马是穆斯林,而不是基督徒”的流言,虽然许多国家领导人像前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也质疑这种臆断的事实在美国这样一个奉行“宗教宽容、政教分离”的国家,居然会成为一个问题,但是对于奥巴马自己,信仰为其当选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这个信仰是:对美国人民的信心、对民主力量的信心,以及对于变革之可能性的信心。那是一种宗教与公民信仰的结合:宗教信仰是个人的事务,公民信仰则是对公众的信任。

因此,奥巴马的当选也证明了我自己的信念——驱使我写这本书的信念和信心。我撰写这本书,首先是借它向我的美国同胞们发出我个人的呼声。这是法国人所说的“*cri de coeur*”,发自内心的呼声。对于美国政府以美国人民的名义,尤其是打着爱国主义——爱国家的旗号的所作所为,我感到非常震惊。于是我想写一本充满爱国深情的书,它要阐述那些我坚信蕴含在美国历史和文化当中的价值,而且对于我所感觉到的、我们在公共政策和个人行为方面未能达到那些价值要求的诸多方面,我要进行坦诚、

审慎和毫不留情的评论。

在这个过程中,我试图甄别美国宪法所倡导的、为公众所颂扬的理想与广大民众的美国社会生活现实之间的差距。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存在于当今,也存在于我们历史的不同时期,这种差距,变成了推动美国进程的动力。这绝不是一个轻而易举或一帆风顺的进程,而是崎岖不平、阻碍重重的磨难,是一个艰苦而缓慢争取消除差距的努力。然而,推动那种努力的正是希望和期待的力量,那是美国公开宣称的价值观所承载的诺言,以及实践那些诺言的坚定信心。这才是美国的爱国主义和美国进步的精神。卡尔·舒茨(Carl Schurz)身为德裔美国人,是美国内战时期杰出的将军、共和党参议员、内政部长、记者、编辑,还是作家,他抓住了这种精神的真谛:

“爱国不是‘爱我们的国家,无论其对错’,而是对的要保持,错的要纠正。”

我是一个美国人,但如我书中所述,由于我母亲的关系,我也是半个比利时人。在生活中,我有很多时间去接触(以及了解)非美国籍的人士,包括我自己家庭中的许多成员,他们尖锐地批评美国的政策、文化以及价值观——至少是他们所认为的美国价值观。我写这本书,也是为那些读者,向他们展示一个骄傲但不是妄自尊大或盛气凌人的美国的理想。在欧洲的许多地方,爱国主义似乎被视为一种文化缺陷,但我并不为爱国主义表示道歉。欧洲人由于亲眼目睹了对国家的爱如何转化为民族主义,而后者又过于容易地变为穷兵黩武,为侵略寻找理由。他们因而对过于简单化地颂扬爱国主义

美德有一种得来不易的抵触,这是有正当理由的。但这不是美国的经验。当看到由各种不同的种族、肤色和信仰构成的美国人,密密麻麻地聚集在芝加哥的大公园(Grand Park),庆祝巴拉克·奥巴马的当选;或是看到非裔美国人排着队,等待多时只是为了投票,再老于世故和不易动情的美国人也会为之感动流泪。

奥巴马当选之后,各国的观察员表示:那些场面唤起了一个“我们乐于热爱的那个美国”。这句话震撼人心,一方面,它证实了一位著名的德国报纸编辑的观点。他认为,现在反美的人先前都是美国的支持者,当美国没能实践自己的价值时,他们感觉遭到了背叛。另一方面,这种观点暗示人们把美国当作一个生机勃勃的孩子——年轻、热情、不知轻重、毫无羁绊。然而,这两种反应更多地发生在欧洲,而不是亚洲。毕竟,欧洲是美国的先祖,而且多数欧洲人会声称自由、民主、平等和宽容的价值是他们自己就拥有的,这使得我去思索一个核心问题。在阅读本书时,许多中国读者很可能都会提出这个问题。我一遍又一遍地据理力争,我所描述的“美国价值观”不单单是美国的,它也是全世界的。诚然,我这里具体描述的这些价值都是美国的。例如,虽然即便在美国,正如我所描述的那样,自由实质上是指“有序的自由”,但是,较之于其他社会所实施的同样的概念,美国人心目中的自由更多地向自由、而非秩序一端倾斜,但对于法国人、德国人、日本人、或者中国人,自由的概念和实施可能理所当然地向秩序一端倾斜。这种不同的平衡体现在世界各地的自由民主国家,它们以不同的方式推行言论自由,这一点已清楚无疑。虽然这些社会也

保障个人自由发表反对政府的言论的权利,但是许多社会禁止社会中一个团体的成员发布仇视另一个团体的成员的言论。其他的一些社会,如德国,则会禁止那些会回复到他们历史中特别黑暗的那段时期的言论或政治集会。

美国的开国元勋们满腔热情地相信,他们有机会建立一个基于普世价值观的政府;他们认为美国“超乎寻常”,不是说唯有美国人能坚守这些价值,而是说他们是第一个以国家的形式去拥抱这些价值。他们是否正确呢?对此,美国人始终坚信不疑,他们拒绝接受十几年前李光耀所提出的“亚洲价值观”的说法。问题不在于否认存在于亚洲社会和西方社会之间的文化差异,而在于他们不能接受亚洲人民并不争取自由这个想法,即:只要不妨害他人,每个人都享有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和养育儿女的权利。很多中国人也许会选择一种与他们的美国表亲非常不同的方式,来行使自由的权利,倾力投入于营建至亲的家庭和稳定的社团。但那并不意味着他们不珍视自主选择的权利。

类似的,民主或是自治,可以有许多种、虽然不是无限多的诠释。正如我描述的那样,纵观美国历史,民主实际上是指受拥戴、负有责任、尊重人权的政府。亚洲人民也寻求一个能够代表他们利益的政府;而我在华期间最意味深长的一些谈话是与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及政府官员之间展开的,我们谈的是政府在制定某些直接影响到民生的决策时,该如何提高中国民众在这些决策中的话语权?中国共产党一步一个脚印地引入了各种改革,如限制领导人的任期,真正地建立起集体领导,以确保政府能够更好地代表更为广泛的中国人民。

平等和公正并非来源于某一种人类文化，而是根植于人类的灵魂当中。正如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在《正义论》中所论证的那样，在自主选择的前提下，当人们被赋予了对社会进行设计的责任，而他们又对自己在那个社会中的地位或能力并不明确时，他们会选择最大程度地造福于最弱势群体的那些组织原则⁽¹⁾。这样的原则可以把社会和经济方面的不平等减到最低程度。罗尔斯认为，这将导致一个必然的结果，即寻求公职和追求社会地位的机会均等原则。

毛泽东曾以平等的名义发起过一场革命；在一个半世纪以前，美国的开国元勋们也是这么做的。点燃革命之火的，常常是因为不公正而产生的愤慨。在一个社会中，少数人拥有极大的物质和财富，而多数人却拥有甚少；人们不得不遵守一些规则，却没有代表参与规则的制订。每一个孩子，无论来自何种文化，都有与生俱来的公正感，给一个孩子一块比另一个孩子大的蛋糕，孩子立刻的反应，无论用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和来自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都是：“这不公平”。

宽容和谦逊的价值观对于人类的和平共处是不可或缺的；它们是世界上一切宗教的核心教义的一部分。确实，我的中国之行带给我的一个经验，就是谦逊对于中国社会的重要性。在中国的外交政策中，政府行之有效地遵循着谦逊的原则。对于信仰，不仅不同的社会，而且不同的个人，都会有不同的定义。但是倘若

(1) 约翰·罗尔斯，《正义论》，(New York: Rutledge, 1971)。

我们指的是在路径未明的情况下,我们仍有能力相信某些事情能够发生,相信看似不可能的事情有可能发生,无论是神明保佑或是通过人类变革的力量,那么,信仰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组成部分。

然而,即便是普世价值观,也没有得到普遍的表达,而且执行起来,其方式也各不相同。这些价值观如何在特定的文化中以特定的语言来进行诠释,它们如何在社会规范和政府规制中得以体现,在历史上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人又是怎样珍视这些价值观,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可以完全不同。在此,我由衷地希望《这才是美国》可以启迪其他国家的公民把自己的国家当作一个理念来进行思考,设法明确这个理念所包含的元素。毛泽东曾经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可以为世界做什么贡献?与此类似地,今天我们可以问:中国的理念是什么?

在尝试回答这个问题时,也许我的中国读者们可以回想一下自己在观看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时的心情。那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情怀呢?是对于国家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吗?是一种按照中国的法则,向世界展示中国的能力,强调跨国界的和平和人类关系的重要性吗?还是因为有一个机会可以迎接四海来宾,弘扬奥运精神的世界性?那种精神包含了哪些要素?它们又是如何在中国的文化、政治和文明当中得到反映的?

无论你对于中国理念持有何种看法,请你也实事求是地看待中国的失败与成功。《这才是美国》所要传达的一个重要思想是,仅仅确定我们的价值观是不够的,同样重要的是,对于我们在何

时、何种程度上履行了这些价值，我们要能开诚布公。这种诚实的态度不仅仅对于国家范围内的对话是重要的，它还能产生出国际间对话所必不可少的谦逊精神。如果各国人民都能从个人和国家的角度，来深入思考一下他们的价值观是什么，对我们在实现这些价值观时所存在的不足采取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那么，我们就会以一个全新的眼光看自己和其他国家。我希望《这才是美国》可以对激发那种对话做出一些微薄的贡献。

前言

我在洛杉矶一家旧书店淘书时，发现了一本名为《自由之路——美国人民史简易读本》(*The March of Freedom: A Layman's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的书。它那黑色的封面已布满尘埃。我打开尘封的书卷，饶有兴致地读完了“一个人找回自我的求索之旅”。作者威廉姆·哈伦·黑尔(William Harlan Hale)⁽¹⁾——集记者、古典主义者、美国之音播音员等多重身份于一身。后来我又发现，他还是哈里·杜鲁门总统(President Harry Truman)信任的顾问。但我对其文章的兴趣远大于其履历。此书写于1947年，正值美国作为二战战胜国中最大的强权崛起于世界之时，黑尔的心境似乎与我现时的并无二致：即自己深爱的国度正变得陌生起来。

黑尔目睹了社会中弥漫的那种“贪婪，偏执，和保守”氛围，如
山雨欲来风满楼般气势迫人。他看到的是一个拥有原子弹进而
能毁灭整个地球的国家，一个“被指责为傲慢跋扈和帝国主义的”

(1) 威廉姆·哈伦·黑尔，*The March of Freedom: A Layman's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47)，第1页。所有我“前言”里的引言要么来自黑尔此书的“前言”9—10页，要么来自正文第1—2页。

国家,同时又“被内部纷争折腾得体无完肤难以动弹”。由于上述原因,我们自身的理想无法实现。黑尔并没有因此而垂头丧气,反而意志更为坚定。为了寻求足以激励复兴行动的力量和原则,他将目光投向了历史。经过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黑尔对那些原则的阐释依然给人以启发。

如今,美国以冷战无可争议的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其实力和财富均举世无双。但每天早上,翻看报纸,我常有一种身处梦魇的感觉。我们在虚伪的借口的掩饰之下,兴冲冲地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如今已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美国士兵和当地平民一天天死去。世界许多地区对我们深恶痛绝,以致凡有美国牵头的政策,出台即亡。甚至我们民主友邦的公民亦认为美国道德败坏,而这并非无稽之谈。

美国国会授予总统对“敌对战斗人员”(enemy combatant)施行终身监禁的权利,从而扼杀了在法庭上对上述羁押提出抗辩的可能性。我们对1945年后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各种国际组织大肆抨击。在国际社会,美国已被孤立。在诸如建立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这样的议题上,我们竟然与利比亚、也门,以及朝鲜这样的国家一道投了反对票,从而站到了北约国家、事实上包括我们所有盟友的对立面。我们已经丧失了外交影响力,甚至连说服大多数拉美国家支持我们的候选人出任美洲国家组织的主席也未能如愿。最糟糕的是,在世界大部分地区,一个戴着头罩、站在木箱上、身体上还拖曳着电线的人的画面已取代自由女神像成为美国的新象征。更为可悲的是,我们那副总统阁下,非但不给国会

领导人谴责上述野蛮行径并努力消除这一负面形象的种种举措施以援手,反而坚称必须授予中央情报局刑讯俘虏的权力。

为了找到一条前进的道路,我也像黑尔一样追溯历史。我们完全有能力重拾自己的价值观,恢复我们固有的本性,找回引以为傲的那些东西。三十年前,世界上千千万万的人把美国与这样一幅画面联系在一起:一名赤裸下体的越南小女孩在燃烧弹的袭击中夺路而逃。但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心目中,这一形象后来逐渐被另外的形象所代替: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站在柏林,呼吁戈尔巴乔夫先生“拆掉这堵墙吧”,1989年梦想成真的东德人正是在柏林墙的废墟上兴高采烈地庆祝这一切的发生;在联合国的授权下,美国率领盟军将伊拉克从科威特驱逐出去;美国大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在联合国力主将非洲艾滋病问题作为一个全球安全议题认真对待;戴顿和平协定(Dayton Peace Agreement)结束了波斯尼亚(Bosnia)战争,后来北约又对科索沃进行人道主义干预以阻止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sevich)新一轮血腥恐怖的种族清洗;还有令人难以忘怀的“9·11”,世贸中心双塔熊熊燃烧的景象,全世界均为之震惊、哀悼并支持我们。“9·11”五年多之后,对于那恐怖的场景,我们仍然无法释怀。然而在这纷争扰攘的岁月里,在国内充斥着单边主义,国外弥漫着反美主义的五年里,我们差不多忘了当时国际上极为短暂的同仇敌忾的时刻,同时也丢掉了团结绝大多数国家一同与恐怖主义及其根源斗争的机会。布什总统告知我们的盟友、同情者甚至那些试图保持中立的组织,他们要么站在

我们一边，要不就是我们的敌人。眼下，不管各国政府如何表态，几乎每个国家的人民都反对我们。

我们已经彻底迷失了方向。要想重新找回方向感，我们必须扪心自问，并就这样一个根本问题进行公开的辩论：美国究竟应在这个世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对我而言，我们能旋即想到一个或许并不完整的答案。我们应该忠于自己的价值观。这些价值是我们的立国之本，也为美国人民树立了一个标杆。忠于那些价值既是目的也是手段。它反映了我们的民族性格，也服务于长远的国家利益。

答案似乎一目了然，但许多像我这样的专业人士——学者也好，外交政策的执行者也罢——却常争辩说美国的政治经济利益往往与我们的价值观相冲突，冲突一旦发生，我们就应以利益为先。他们还说：我们付不起幼稚或理想主义的代价，实力才是国际政治领域通行的货币。通往和平与繁荣的道路需要的是实力，也就是说我们应该积累和掌握比其他国家更为强大的实力，不管所采用的手段是否与我们宣称的价值观相悖。照此逻辑，言行不一不过是安全的代价罢了。

毫无疑问，美国必须有足够的实力去保卫我们的国土、保护自己人民的生命和福祉。这是任何一位美国总统最起码的责任。我们也必须拥有足够的实力以便追求更远的国内外目标。但那些目标远远超出了出于自我利益的这种权力积累。美国从来没有完全接受国际体制中的传统游戏规则。从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到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再